

第一章 喷薄欲出

一、民主共和国的曙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是20世纪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世界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风雨如磐

中国作为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在过去的许多世纪里一向以经济的繁荣、疆域的拓展、文化的灿烂、民族的融和而闻名于世，它的伟大成就和发明创造，曾给予世界历史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但是，自19世纪中叶进入近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在国家地位上逐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

资本帝国主义各国侵略中国，除赤裸裸的掠夺以外，还强加给中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断攫取在华的种种特权。在中国的领土上，有外国的殖民地——租界、租借地、割让地等‘国中之

国”；中国主权的行使和国家的内部事务，经常受到外国的支配和操纵，使中国虽然形式上保持独立，实际上却丧失了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几乎大部分属性。帝国主义之间争夺在华利益的矛盾，造成中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不统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派军政势力各霸一方，争战不已，政出多门，律令不一。自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无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统一的中央政府，也没有整个国家的统一，基本上处于国家四分五裂、人民一盘散沙的境况。中国社会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历史，从来缺乏民主与法制的传统。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君主专制政治，但未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中国社会的民主状况并无根本改变。从北洋军阀政府到国民党政府对中国的统治，本质上都带有专制和独裁的性质，不仅广大工人、农民和普通民众没有任何民主权利，而且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也没有政治发言权。这些，就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的国家地位和国内的基本政治状况。

近代中国在经济形态上属于半封建半资本主义性质。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给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向近现代经济的转型带来极其复杂的影响。它强行打开了封建统治下长期封闭的中国大门，迫使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城乡经济被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体系；中国的民族资本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双重挤压下畸形成长，勉强维持民族工业及与之相关的手工业的发展，推动资本、劳动力的流动和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使之逐渐成为反映社会分工、扩大各要素市场的重要因素。鸦片战争后不到百年，全国的埠际贸易增长了四十余倍，沿海一带出现十分繁荣的通商大埠，并辐射周边地区，形成初步的网状大流通商路以及商路沿线的若干流通枢纽，某些地域性的市场成为大宗商品的集散地，并出现像上海这样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具有国际影响

的贸易、金融中心。应该说，这些变化为自给型经济向商品货币型经济的逐渐过渡，准备和积累了基础性条件。

但是在 20 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环境条件极其恶劣。帝国主义利用强权把持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以不等价交换对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源掠夺；作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代表的买办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密切结合，对民族工业和农民小生产者实行直接的经济压迫和重利盘剥，市场交易过程中渗透着政权、族权、亲权、地方霸权等诸多非经济因素。绵延不断的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造成城乡隔绝、民生凋敝、流通滞塞、金融混乱，使商品经济的发展更加举步维艰。这些恶劣的环境因素，在根本上阻滞了中国走向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直接障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总的来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一方面逐渐瓦解了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使中国不可能继续保持完整的封建经济形态，客观上给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带来了生长的机遇和某些便利条件。20 世纪初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初步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趁着帝国主义战争的间隙，在一些行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另一个方面的严重情况是：中国民族工业的这种发展，始终受到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买办势力的扼制和压迫；同时，又不断为国民党“围剿”共产党的内战和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的战争所阻滞。直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期，本来已十分虚弱的民族工业遭到更大的摧残和破坏。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在美帝国主义扶植下疯狂扩张、急剧膨胀，大大强化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地位。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倍感艰难，日趋衰落，大多濒于破产、半破产境地。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代表着一种比较进步的生产关系，对于促进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近代化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在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本垄断经济命脉和商品市场，封建势力又设置重重障碍的情况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苦于在夹缝中求生存，虽有一定发展，但又发展很不足，力量非常薄弱，在产业结构和地区分布上也是畸形的。因而，资本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所赖以生存发展的包括各生产要素的市场体系及相应的经济关系，远未发育成熟。就全国而言，商品经济的发育程度极不平衡，仅在东部交通条件较好的少数沿海和近海地区，农产品中经济作物的生产同国外市场有着较密切的联系，通常有 50%—70% 的农产品用于市场交易，而在内地大部分地区，农产品的上市量仅在 5%—10% 之间，商品率甚至低于日本近代经济开始起步的明治时代的水平。总之，在近代中国，尽管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但封建生产关系的根基——封建土地所有制依然存在，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居明显的优势地位。这些情况，反映了旧中国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

旧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在对外部关系方面，主要是严重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及其控制的世界市场。在内部关系方面，主要是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对外贸易、国内商业、金融业、关税、财政等经济命脉都由帝国主义控制或操纵。传统的农业、手工业一经与世界产品、世界市场发生关系，农民小生产者就越来越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和生产安排，只能听由国际资本主义所控制的世界市场摆布。工业方面的依附性，首先是在机器、设备、技术上依赖外国；相当一部分资金要靠外国银

行调剂 许多工业的原料、材料、燃料要从国外进口。在工业结构方面，也不能不适应帝国主义掠夺投资场所、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的需要 中国的轻纺业、采矿业、修配业、消费品的生产比例畸重，几乎没有或很少有重工业和交通、能源等基础工业。在地区分布上，中国仅有的工业，大都集中在上海、天津等帝国主义设有租界、便于控制的口岸城市；广大内地城市工业发展水平极低，甚至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业。金融业方面对帝国主义的依附性更强，外国在华银行不仅能在中国发行纸币，而且还强力操纵中国的国际汇兑和外汇比价，并通过所谓经济贷款和政治借款，掌握了对中国铁路、电信等重要部门的财产、收入及政府关税、盐税、厘金等捐税的监督管理，使中国财政的支配权大部分落入外国人手中。总之，经济上的对外依附性，是半殖民地中国的一个基本特征。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强大的外国资本的排挤下，又受到封建买办势力的束缚，始终不能顺畅地发展。这就使近代中国在经济上和教育、科学、文化上都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

从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 中国的一切有识之士，一切爱国的团体和近代意义上的政党派别，都力求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和被动挨打的地位。多少仁人志士舍身取义，奔走呼号，力主“变法维新”“富国强兵”举凡倡洋务、办实业、兴新学等种种救国方案均逐一推行实验，试图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这些努力统统失败了。这主要是由于近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时代，正逢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进入帝国主义的阶段，西方国家竭尽拼抢世界市场份额，建立和巩固自己的垄断地位，唯有不遗余力地掠夺和榨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源，自然不允许拥有偌大市场 and 丰富资源的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近代中国之所以不能从封建制度发展到资本

主义制度，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总之，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买办势力的联合统治，既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和衰弱的根源，又是中国民族灾难的根源。

在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适乎世界之潮流 合乎人群之需要”领导发动了推翻清王朝腐朽统治的辛亥革命，在风雨如磐的中国树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旗帜。封建专制制度在中国从此不得人心，中国人民开始有了新的觉醒。青年毛泽东就曾宣称：既然“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那么对于推翻一切封建专制的东西“我们有话要说 有事要做 是无论何时可以说可以做的”。就在辛亥革命后不久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随后，中国爆发了以反帝反封建为鲜明主题的五四爱国民主运动，新兴的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孙中山先生积四十年的奋斗而致力倡导的民族、民主、民生三大主义，终于在中国找到它的物质承担者和忠实实行者，并且日益走向别开生面的创新。

主要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力量过于强大的缘故，孙中山所缔造的中华民国，终究未能实现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在辛亥革命后的三十八年间，中国曾经历过许多届各式各样的政府 从袁世凯窃夺民国建立的北洋军阀政府 到皖、直军阀在“恢复共和”名义下控制的北京政府；奉系军阀操纵下的临时执政府和军政府；在南方，曾短暂地建立过护国政府和护法政府；孙中山的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和广州国民政府；在北伐战争期间，出现过宁汉对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最后，号称使中国“归于一统”的是 1927 年 4 月 18 日蒋介石国民党在南京建立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要以北洋军阀和蒋介石国民党两大统

治集团为代表的历届中国政府，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实行的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专政。这只能使中国社会继续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根本不可能通过独立发展资本主义走向国家的富强。孙中山先生在他的有生之年，曾以“护国”“护法”相号召，苦心孤诣，砥力奋斗，但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集团的夹攻下，终未实现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他所创立的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也被蒋介石集团窃据为反共反人民的工具。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命运的重大使命，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身上。

开天辟地

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时虽然只有几十个人，但却是近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创立，是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在同孙中山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人致力于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大联合，迅速掀起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1927年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叛变革命以后，共产党人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走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领导工农群众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为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中国的历史，系统地总结了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逐步深刻地认识中国的国情，富有独创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

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确定了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提出和实行了包括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在内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策略，制定了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总纲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总纲领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千千万万工农劳苦大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包括受到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着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集团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期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逐渐开辟了幅员广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那里建立起实行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人民政权。在近代中国，首推共产党致力于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社会，率先在它领导的军队和农村政权中实行一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主制度，在不断扩大的根据地、解放区相继建立了工农民主政府、抗日民主政府和人民民主政府。虽然在各个历史时期根据地、解放区的政权基础、阶级构成、政府名称及组织机构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含有共产党领导、工农联盟为主体、民主集中制、代表会议制、议行合一及群众路线等人民民主的核心内容。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区域性发展和渐次扩大，在全国近三分之一的地区树立起崭新的民主风气和民主建政的传统，并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摸索和总结出一套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基本经验，从而为把新民主主义制度推向全国奠定了基础。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一贯站在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最前列。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中流砥柱之气概，始终坚持团结全民族实行人民战争的积极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压迫中国人民的消极抗战

路线，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并在解放区坚持不懈地进行广泛深入的民主建设，使抗日民主政府成为民主中国的模型。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这是党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举行的最盛大、最成功、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在决定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历史航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七大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产生后领导中国民主革命二十四年来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近八年抗日战争的经验，明确规定了一条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政治战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七大的一个重要历史标志，是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一致承认的指导思想。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这表明党历经二十四年的曲折奋斗，已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且经过反复比较，郑重选择，有了它的主要代表和全党公认的领袖——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达到成熟的重要标志。

为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民主改革，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七大提出“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口号，明确指出“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已被历史证明为完全破产了。在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大前提下，新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旧式的纯粹民族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并且在现阶段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新中国应该建立一个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统

一战线的各革命阶级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对于新民主主义国家应该实行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纲领，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作了详尽的说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主张，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普遍支持和拥护。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党所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武装力量日益壮大这一决定性因素，中国人民历经八年全民族的抗战，终于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中国人民在近百年来历次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解放斗争中，第一次取得完全的胜利。

还在最初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最艰苦的岁月，毛泽东就曾热情洋溢地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到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前所未有地壮大起来的时候，毛泽东在他所著的《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和纲领，并满怀信心地昭示：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面前，我们应当欢迎它。

——新中国的航船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鼓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在举国欢庆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日子里，历尽漫漫长夜的中国，终于盼来和平发展的晨曦和民主共和国的曙光。

争取和平建国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渴望和平建国的愿望，真诚地希望在国际国内和平的条件下，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民主、统一、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却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企图独霸抗战胜利果实，伺机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使中国仍旧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这样，建什么国的斗争，就成为战后国内一切问题的焦点。国共两党围绕这个焦点进行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斗争，构成了战后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

由于战后美、英等国同苏联形成既相斗争又互有妥协的新的国际格局，国内呼吁和平的舆论十分强烈，蒋介石要立即发动内战一时有许多困难，特别是调集军队需花费时间。为此，蒋介石一面依靠美国提供飞机舰船，紧急运送国民党军队抢占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同时又摆出一副“和平”姿态，连续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讨论国际国内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认为，争取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是必要的，这是中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和利益所在，党有责任带领人民尽最大努力去争取一个有利于人民的哪怕是暂时的和平建设时期，同时不放弃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为此，毛泽东不避艰险率中共代表团前往重庆谈判和平建国问题，受到国内外舆论的热烈欢迎。

重庆谈判是一场尖锐的斗争。对于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蒋介石坚持要在“政令军令统一”的幌子下全部取消和吞掉，他一面在谈判桌上虚与委蛇，一面密令国民党军沿各铁路线向解放区进击，使谈判自始至终处在边打边谈的非常状态。由于中共代表作了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必要的让步，解放区军民站在

自卫立场上坚决击退了国民党军的多路进犯，终于迫使蒋介石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以及人民军队的一定地位。经过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和军事斗争，国共双方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确定召开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国共双方又签署了停战协定，同时召开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协调一致，共同努力，在中央政府的组成、民主宪章等问题上再次作了必要的让步，促使政协会议达成多项协议，确定改组国民党一党政府，实行国民大会制、内阁制和省自治，以推行中国民主政治。

对于在政协协议中所作的政治上的让步，中共中央认为：中国政治的进步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所以同意采取这些让步的方法，为的是逐渐地促成国内政治的进步。尽管政协协议的内容，同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还有很大的距离，但它在实质上是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的否定，因而基本上符合全国人民的和平民主愿望。只要照着政协协议做下去，中国是会朝着新民主主义方向发展的。政协协议公布后，中国共产党即准备严格履行。毛泽东在颁布停战令时指出：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从此即将开始，全党应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这再次反映中国共产党为通过和平道路实现中国社会政治的改革付出了最大的努力。

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基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极其狭隘的利益，决不容忍在中国进行任何民主改革，即使是美、英所希望的那种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也拒绝实行。他们根本不打算履行政协协议和停战协定，相反，蒋介石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

把麇集西南、西北的国民党军队抢运到华东、华北、东北 最终完成内战部署。1946 年 6 月底，蒋介石下令国民党军队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悍然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

以蒋介石国民党公然撕毁政协协议、破裂国共合作关系为标志，和平建国的大门已被彻底关闭。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国政治形势急剧变化，国内阶级矛盾——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不但重新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且以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武装斗争表现出来。不仅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从统一战线分裂出去，而且原来包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的地主、富农及其他封建势力也随之站到人民的对立面，成为国民党政府进行反革命内战的社会基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发展，使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关于“建什么国”的斗争，迅速演变为关于黑暗的中国还是光明的中国这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历史性决战。

历史的转折点

对于蒋介石挑动内战的图谋，中国共产党在七大时早有预见。抗战结束后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也强调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在应付内战的各项准备中，大力争取东北是一项带战略性的重大行动。鉴于东北拥有近代大工业、城市发达、交通便利的地位，毛泽东早在七大所作结论中提出：只要我们有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在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从延安致电毛泽东、周恩来 确定了“向北发展 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迅速从山东等解放区抽调主力部队和大批工作干部，日夜兼程开往东北。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 20 人（包括 4 名政治局委员）先后进入东北。与此同时，南方解

放区各部队遵照中央部署，主动撤离原驻地，大踏步向北发展。这样南北呼应 紧密配合 基本控制了冀、鲁、热、察、辽一线 并向东北广大地区纵深展开，形成环环相扣反击国民党军事进攻的有利战略态势。

全面内战爆发之际，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人民解放军总兵力 130 万、正规军仅 61 万，且装备落后。解放区几乎没有近代工业，又无任何外援。国民党军总兵力达 430 万，正规军 200 万，控制着全国几乎所有大中城市及铁路交通线，并有美国的经济、军事援助。面对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对战争前途作了正确分析，指出人民解放战争具有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是战胜蒋介石国民党的政治基础，全党对此应有充分信心。针对党内对国际形势的某种悲观估计，毛泽东作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科学分析了战后苏联同美、英、法国在若干问题上的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反动力量作了坚决有效的斗争的结果，“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基于在战略上必须藐视敌人的深邃思想，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同美蒋反动派斗争的勇气和决心。

为了战胜敌人，中国共产党在七大纲领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正确方针和具体政策。在政治上，紧紧掌握和平民主的旗帜，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在经济上，切实保护工商业，努力发展解放区生产事业，一切依靠自力更生，立足于支援战争的长远打算。在军事上，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一般采取运动战的作战方法。在城市中，除团结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以外，注意团结一切中间分子，孤立好战分子。在农村，最重要的是坚定地解决农

民的土地问题。1946年5月中央发布《五四指示》在地主阶级、封建富农追随国民党统治集团破裂民族统一战线，配合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军民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坚决肯定和批准农民用减租清算的方法没收、分配地主和封建富农土地的正义行动，规定不得侵犯中农，保护民族工商业等政策，推动了各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迅猛开展，使人民解放战争赢得了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群众的有力支持。

在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人民解放军主动避开敌军的锋芒，在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中，集中优势兵力，寻歼敌人的有生力量，使敌军在战争的头八个月里，就因战线延长、兵力不足而丧失了全面进攻的能力，不得不改变战略，对山东、陕北实行重点进攻。为了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于1947年3月9日主动撤离延安，由刘少奇、朱德组成中央工委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与敌周旋。在几十万敌军穷追堵截的险恶环境下，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始终运转自如。在钻山翻岭、昼伏夜行的辗转迁徙中，党中央、毛泽东游刃有余地指挥着全国各个战场解放军的作战行动。仅四个月时间，敌人对山东、陕北的重点进攻即被粉碎，人民解放军在许多地区开始局部反攻。

在这一阶段，蒋介石不仅遭到军事上的严重失败，而且在政治、经济上面临全面危机。由于国民党政府自抗战后期以来，腐败程度日益加深，除顽固坚持内战独裁政策外，还签订卖国的《中美商约》实行压榨人民的反动财政经济政策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同美国的独占资本紧密结合，控制着全国的经济生活，造成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民族工商业日益破产，劳动群众和公教人员的生活日益恶化，迫使包括民族资

产阶级在内的各阶层人民联合起来为求生存而斗争。在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以青年学生掀起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为先导，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日渐高涨，逐渐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战争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解放区战场和国统区民主运动这两条战线，迅速汇成中国人民革命的新高潮，使国民党政府陷入全民的包围之中。

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从内战爆发到 1947 年 6 月人民解放军在一年内的内线作战中平均每月歼敌八个旅，共歼敌 112 万人，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转入全面防御。解放军则不断壮大，发展到 190 万人。根据敌我力量的消长和形势的变化，党中央、毛泽东决定抓住时机，由局部反攻直接转入全局性战略进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按照中央“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部署，1947 年 6 月底，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 12 万人，在鲁西南一举强渡黄河，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随后，刘邓大军以锐不可挡之势，突破数十万敌军的重重追堵和各种难以想象的障碍，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插敌人战略后方。与此同时，晋冀鲁豫另一支主力部队 8 万人在晋豫交界处渡过黄河，依托伏牛山向豫西展开进攻。9 月，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 18 万人越陇海路南下，在豫皖苏地区灵活转战，机动歼敌。配合三路大军南下，陕北、山东各部队分别展开攻势作战，有力地牵制了敌军向南增援。在“中央突破，两翼展开，三军挺进，互为犄角”的进攻态势下，各野战军在江、淮、河、汉广大地区纵横驰骋，大量歼敌有生力量。到 12 月，人民解放军即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中国革命发展到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鉴于蒋介石彻底关闭和谈大门，宣布实行所谓“戡乱总动员”，誓与中国人民为敌，中共中央于 1947 年 10 月适时地提出

“打倒蒋介石 解放全中国”的行动口号 这个口号体现了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指明了奋斗目标和政治方向。为了迎接人民大革命高潮的迅猛到来，党把全面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作为打败蒋介石国民党的一个重要环节。1947年7月至9月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 制定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使平分土地的浪潮迅速席卷自太行山区到山东半岛，从长江北岸到松花江畔的广大解放区。翻身农民努力生产，踊跃参军支前，成为解放战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为了准备夺取全国胜利，1947年党中央举行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深刻阐明历史转折期党在各方面的纲领和政策：政治上重申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基本纲领；军事上总结和提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经济上明确宣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十二月会议后的几个月内，党中央集中全力解决新形势下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和策略问题，及时纠正土改和群众运动中存在的侵犯中农利益，破坏民族工商业，排斥开明绅士，对待地主和富农不加区别等偏差 使革命战争、土地改革、整党整军、发展新区和争取民主党派等方面的工作，都取得显著的成绩。为了保证党的纲领和各项方针政策畅通无阻地贯彻执行，毛泽东特别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告诫全党必须紧紧掌握党的总路线；必须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必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组织性纪律性。这样，就使全党在正确路线和政策的基础上保持了高度的统一，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